

中共“八大”前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康沛竹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越来越大,经济体制方面一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八大”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 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2)05-0102-05

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越来越大,经济体制方面一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八大”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一、探索经济体制问题的提出

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1](P831)。当时,我国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基本上是学习和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国家直接管理和指挥整个经济和企业的活动,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实行“计划大包揽,财政大包干,物资大统配,劳资大统一”。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确是十分必要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财政的集中,稳定金融,统购统销,稳定了物价,这是很大的成绩。”[2](P271)“一五”计划各项主要指标的提前完成,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在于: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方面,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3](P13)。主要是对小工商业和小手工业过多地合并与统一,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第二,在经济管理中,从生产指标到物资分配、购销等各个环节,中央集权过多,国家统得过死,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第三,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在国营内部实行派货制度,基层商店不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直接向工厂订货或采购,使生产和流通中出现了产销脱节、供求不一的现象。农副产品基本上是由国营、合作社商业独家经营,限制了私商的积极性,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调节机制。第四,在劳动报酬上搞平均主义,逐渐造成“铁饭碗”、“吃大锅饭”的状况。上述弊端,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缺乏应有的活力。“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4](P464)若不进行改革,势必更加抑制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妨碍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提出和探索是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深入调查听取汇报开始的。1955年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刘少奇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听取了八个部委的汇报。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2日,毛泽东外出调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

收稿日期:2002-07-20

作者简介:康沛竹(1964—),女,内蒙古海拉尔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下广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向各省干部了解情况。所到各省的负责人纷纷反映中央对经济统得过死,严重束缚地方和企业的手脚,希望中央下放权力。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办负责人的汇报之后,各省市区进行汇报。毛泽东还采纳了李富春的建议,全国工业交通运输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向中央写出书面汇报材料。

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听取汇报之时,正值苏共二十大召开。34个部委向毛泽东汇报与苏共二十大召开,恰巧都是2月14日开始。24日深夜苏共二十大闭幕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全盘否定,并第一次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中存在的阴暗面和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病。尽管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但这对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条件,这使得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的“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刘少奇也说:“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许多经验还值得研究。”[5](P371)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汇报上来的有关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分配问题以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体制问题,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对于《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指出“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6](P23)《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政策的开始。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设想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涉及到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成分的结构、所有制关系、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行机制、分配制度等等,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

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设想。

1.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到1956年底,我国已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在改造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除了后期急于求成之外,还存在一些盲目求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有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而且公有程度越高越好。这种思想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是不相适合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公私合营后,私营经济已基本销声匿迹,但很显然,国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地下工厂、商店等。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等人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民主党派开会的情况,其中提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一部分工商业者消极,白天社会主义夜里资本主义,出现了地下工厂、商场等。1956年12月,毛泽东约黄炎培等人谈话,提出中国还需要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6](P170)。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都是支持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发挥。刘少奇曾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可以准许他们盖。[5](P382-383)周恩来在八大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就指出,“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2](P307)。商业方面,“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2](P312)。他还提出:“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人可以开。”“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2](P350-351)

在这个问题上,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在八大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3](P239、13)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

2. 改革管理体制,给地方、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毛泽东外出巡视和听汇报期间,各省市反映比较集中和迫切的一个问题,即希望给地方更多的经济权利。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放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说:“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6](P31)毛泽东说,“现在中央各部就好像抱了一抱鸡蛋”,而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毛泽东比喻说:“我们过去背个筐子,现在挑个担子。过去背五十斤,现在可以担一百斤,重量可以更大,生产更增加。”[2](P270、P266)

周恩来认为,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中央要分一部分给地方,主要的是为了增产,而不是分产,这是大原则”。“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有权才能动员。地方除了有党权、政权(就是行政权)以外,还要有人权、财权,有权就能增加生产。”他说:“最集权就等于无权,碰到的事

管一下,碰不到的事就管不上。”“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2](P266-267)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因为地方比中央更加接近企业和事业的基层单位,更加接近群众,也更加容易了解实际情况,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就能够更好地把地方上的一切力量,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指出“改革体制要逐步实现,某些重大的改变,应该采取今年准备、明年试办、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的步骤,稳定进行”[2](P315)。

在管理体制问题上,除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以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还特别关注到企业的自主权问题,他们提出企业要有“独立王国”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措施: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减少指令性指标;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扩大企业的财权;增加企业的人事管理权限等等。他们还主张在一些部门试办托拉斯,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托拉斯之类的企业组织形式,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和企业,托拉斯可以减少行政干预,减少中间环节,直接面向生产,面向企业,有助于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1964年8月,中央批准在全国试办12个托拉斯(主要在工业和交通部门),刘少奇亲自抓了托拉斯的改革。另外,建国初期,我国企业的管理方法是采用苏联的“马钢宪法”,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完整地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认为这是“鞍钢宪法”。此后,国内许多大型企业都陆续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70条》正式肯定了这个制度,并且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

3.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

陈云较早地注意到生产、流通中存在的问题,他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中,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模

式。他认为,自由生产、自由市场应作为计划生产,国家市场的补充。刘少奇也在讲话多次提到,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是计划经济,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类,而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我们只强调计划,就会搞得简单、呆板,“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为此,“一定要有一些下面那样多的小计划,和中央的计划互相调整。但只是计划调整还不行,还要利用价值规律”[7](P506)。周恩来在1956年9月《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若干主要问题》中谈到,“由于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就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说,我们必须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加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将要采取的措施,“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2](P309、P311)。

4.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

针对我国在分配问题存在的不合理现象,打破“铁饭碗”,中央决定对现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周恩来在1954年第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工资制度在过去几年内有了一些改进,但是目前仍然相当混乱,而且平均主义现象还没有克服。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点。平均主义妨碍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企业中的奖励制度现在也很混乱,必须加以整顿。同时,在政府机关和某些国营企业中,同工资制并存的还有供给制的待遇办法,这种办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同按劳付酬原则

和经济核算制是矛盾的,在今天已经是害多利少了。因此,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定出妥当的方案,争取在几年内使全国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达到基本上统一合理,并且把供给制逐步改变为工资制”[2](P197)。1956年进行了工资改革,建立新的薪金制度、升级制度,并扩大计件工资制的范围等,改进后的职工工资等级制度,“对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与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规定了比较明显的差别”,“适当地扩大了低等级工人与高等级工人的差额”,对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技术人员,规定了较高的工资标准,并对其中一部分人加发技术津贴。[2](P273-277)周恩来还提出,要注意社会分配的公平原则,他在《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中说:“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2](P375)

三、结束语

“八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八大”召开前后,我党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基本思路、方案等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初步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八大前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时机是得当的。从国际上看,苏共“二十大”召开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前车之鉴”,使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体制,不能再继续照搬“苏联模式”,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从国内情况看,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对建国初期的经济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国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为了迎接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到来,为了推动国民经济的更加迅速地发展,改革原来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已成为必然。1956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问题会议,拟出

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初步草案。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的讲话都阐述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1957年初,中央指定陈云主持财经五人组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半年多的调查、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的决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案。这三个规定,是针对当时中央集权过多、管得过死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改革的方案是合理的,方法步骤也是稳定的。其着眼点主要在于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可以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实践证明,这种改革的构想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适合,切中时弊。

当然,这次经济体制改革,仅仅是在计划经济模式内做改进和调整,主要集中于“放权”与“收权”上,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受传统观念的来源,因此没有真正认识清楚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所以改革和调整都不可能突破原有体制,基本上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作了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回答。

“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是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开始和进行的,因此,尽管留下了许多遗憾和教训,但它也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八大”前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应该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必备条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见解,比如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式等等,这些思想,有的已被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发展,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3] 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5] 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

A Probe into the Economic System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ound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KANG Pei-zhu

(School of Marxist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 highly centralized economic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With time passed, shortcomings of this system became apparent. Therefore, around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ers such as Mao Zedong, Zhou Enlai, Liu Shaoqi, and Chen Yun made a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and made some tentative reforms of this system.

Key word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probe

(责任编辑 何方)